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外语教育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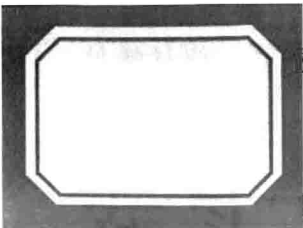
在实践中 培养跨文化能力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Practice

Michael Byram, Adam Nichols, David Stevens 编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交际丛书·外语教育系列

在实践中 培养跨文化能力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Practice

Michael Byram, Adam Nichols, David Stevens 编

贾雪睿 贾雪莱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实践中培养跨文化能力/(英)拜拉姆(Byram, M.)等编;贾雪睿,贾雪莱导读.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外语教育系列)

ISBN 978-7-5446-3511-0

I. ①在… II. ①拜… ②贾… ③贾…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044 号

© Michael Byram, Adam Nichols, and David Stevens 2001

This edition of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Practi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ltilingual Matters/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Ltd and is for sale only in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 China.

Licensed for sale in China only; not for export.

本书由 Multilingual Matters/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Ltd 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图字:09-2011-665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蔡一鸣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394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3511-0 / G · 1078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副主任

Bates Hoffer (三一大学)

Nobuyuki Honna (青山学院大学)

Steve Kulich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 凌 (香港浸会大学)

高一虹 (北京大学)

委 员

Andy Kirkpatrick (科廷大学)

Michael Byram (杜伦大学)

Michael Prosser (上海外国语大学)

Richard Wiseman (加州州立大学福勒顿分校)

Robert N. St. Clair (路易斯维尔大学)

陈国明 (罗得岛大学)

顾嘉祖 (南京师范大学)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

申惠中 (悉尼大学)

宋 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力生 (浙江大学)

张红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惠晶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庄恩平 (上海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总 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 世纪 60 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 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的差异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动态多变的过程中去。以此为基点,William B. Gudykunst 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

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学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 曾在其著作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一书中总结了 15 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在 21 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至 20 世纪的 80 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视,在“文化热”和“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 and 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 and 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院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 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世界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6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2000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视角独特的观点。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上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学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学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20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liam B. Gudykunst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

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年4月

序 言

21 世纪的全球化是对教育的挑战,也为教育改革开拓了新的视域。面临这一挑战,外语,作为构建人类社会关系与和谐全球社会的重要人类社会资源,应当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培养世界公民将是 21 世纪赋予外语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语言教学——母语/一语、二语、外语或其他民族/族群语——实质上,无一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无一不是为了培养国家/全球公民。外语教育在(全球)公民教育中有其无与伦比的、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人文价值,但目前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学习者在 21 世纪正面临的挑战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我们目前的外语教学是否胜任 21 世纪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综观外语教学现状,我们认识到应该深入发掘外语这一重要的人类社会资源,以使外语教学向全球公民教育的转变成为可能。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几十年中,随着国内和国际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语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外语教学不断应变,与时俱进,实现了以目标语语言能力为教学目标向以目标语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跨越。但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时代,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目标语的交际能力难以确保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相互沟通 and 理解:母语/一语的交际能力是国家价值观的标志,是国家身份(国家公民)的象征,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作为共同语的英语或其他语言的交际能力的习得能否说明他们就共享了同一套价值观,从而可使他们的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以目的语的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学能否像通过母语教育培养国家公民那样培养世界公民?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价值观、信仰之相对性的存在以及应运而生的文化、语言、社会语言、社会语用、概念相对性的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远比我们所预想的复杂得多。仅以概念相对性为例:我国及其他国家英语使用者都用通用的英语单词

“citizenship”表达“公民、国民”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所内含的核心价值却因文化而异,我国与西方所使用的这同一概念的核心价值便相去甚远。且不谈西方国家对“citizenship”之概念在语义方面的认知差异,他们的“citizenship”价值内核大体上是“民主”框架内的人权和个性自由,而我们这一概念之内核则更加突出道德和社会责任义务,尽管两者是人类尊严的既对立又互补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近年来在交际能力基础上所构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会大大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际,但促进这一能力之习得仍然难以胜任世界公民教育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既能确保不同文化间的交际得以进行,同时又能保留不同文化之相对差异的一种跨文化交际能力,一种与全球公民概念相匹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达到培养全球公民的目标,当下外语教学所匮乏的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之作为公民的核心价值为起始点和终极目标的教育观,也就是确立人之作为人的基本道德的人文价值的教育观(the core value of a person as a human being);另一点是由于这一人文价值因时空而异,即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经济、历史、政治等)发展阶段对人之作为人/公民的基本价值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界定。这意味着在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 21 世纪,任何文化之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也意味着在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 21 世纪,任何文化都不能把自己对这一价值(譬如对人的基本价值)的经历、自己的文化内涵、解读和界定强加给别人。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政治或宗教的)、不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持有赞同、欣赏、理解、包容和接受的态度;但当这些方面发生冲突时,我们并不能盲目地理解或接受某些观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理性的思辨和批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精神,而且,批判之标准有的是普适的,有的是因文化而异的,是多元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公认的人文价值标准,一种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平等共处的人文价值观。

为配合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的基础上,又引进推出一批从跨文化视角进行外语教学的权威力作。这一批以国际著名外语教育家 Michael Byram 教授为首的学者们的著作,是英国多语出版公司(Multilingual Matters LTD)出版的丛书“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LICE)

中众多专著/文集的一部分。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对以跨文化交际为目标的外语教学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和实践,对教学理论、课堂实践和成果评估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析和阐述。他们所提出的教学目标、教学框架、能力模式、概念、理论、观点、途径、方法以及对整个教学结构的设想,不仅具有挑战性和时代的前瞻性,而且尤其可贵的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远见卓识无疑引导着当今世界外语教学改革潮流。

应特别提及的是,Byram 教授在其《从外语教育到跨文化公民教育》(*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一书中,在原有的交际能力以及早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批判性跨文化自觉”为中心的、与世界公民相互互补的“跨文化能力”概念。这一概念创新旨在帮助实现外语教学向外语教育的转变,实现以语言能力、目标语的交际能力以及早期界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学向全球公民教育的跨越。Byram 教授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为全球公民教育提供了依据,而且在实际教学实践中也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因为他把这一跨文化能力细化为具体的教学目标,使将公民教育变成课堂的教学实践成为可能。

Byram 教授及其他学者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是在欧盟的背景中构建的,如何将他们的经验运用到我国的实际需求,需要深入结合我国特有的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框架,但其中所涉及的种种探索对我国外语教育无疑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必定会引发新的思考。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我们提供这样一套好书,为我们构建了跨文化交际的学习空间。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会促进我国作为世界公民的外语教育的蓬勃发展。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Preface

When the LICE series was launched just over ten years ago, we could say that it was already a commonplace to talk of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ur aim was to develop a series of books which would contribute in different ways to the UNESCO call that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on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iving together’ and ‘dialogue’ are, ten years later, frequently heard key words in policies and curricula for 21st century edu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has gone from being an emergent concept to being part of much mainstream policy discuss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 worldwide.

Language education is often sub-divided into ‘mother tongue’ or ‘first language’ (e. g. Chinese in China, German in Germany, etc.) and ‘foreign language’ (e. g. English in China, French in Germany, etc.) with a further category of ‘second language’,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a country as taught to minorities (e. g. Italian taught to the German minority in northern Italy, an ‘old’ minority, or Danish taught to migrants arriving in Denmark, a ‘new’ minority, with many other examples and variations on this theme). The complexity of people’s mobility and migration which has grown so rapidly with globalisation makes such simple categories out-dated. Learners come to classrooms in formal education systems with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 and, in the same classroom, the language being taught may be ‘first’ for some, ‘foreign’ for others, ‘second’ for yet others — or ‘third’ or ‘fourth’ for others again — and all this does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ays in which a ‘second’ language can become ‘first’ as people change their circumstances.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learn more and more often in informal situations: immersed in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s, in front of their computer screens and the inter-

net, watching films and television in other languages on multiple channels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ir own. In the midst of this language complexity, the questions of cultural learning and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through a language add further complexity.

The purpose of the LICE series was a decade ago, and remains today, to encourage the study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ways which can provid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which faces us, and thereby enrich practic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n the one hand the series includes books which inform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and-culture teaching can be structured and developed in practice.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Practice* is an example where teachers and other practitioners write about their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Becoming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rings into one volume descriptions of practice from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also from the world of business train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tudies of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which provide a firm basis on which to build practice and develop new ideas. *Language and Culture Pedagogy: From a National to an International Paradigm*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argues for a perspective which goes beyond the national;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also reviews and critique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rgues that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t about the same time as the LICE series was launched in Britain, a new curriculum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was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01. It referred explicitly to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cultur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skill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ad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to curricula in Britain and North America (Han, 2011). Now, as the LICE series is launched in China, the Chinese curriculum has been revised and is about to be implemented in its new version. This is a recognition, as in

other count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import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learning. However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a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origins of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older, and ‘can be traced in China to 1950, when a book *Language and Culture* written by Luo Changpei was published’ (Qian, 2011: 85).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50s,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1980s, have been substantial and in many cases have taken note of parallel events in western countries.

What is clear to us as LICE editors is that our series has enabled scholars worldwide to find a platform for investigating, describing and reflecting upon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have changed in recent times. However, we are aware that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have access to books from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for teachers who are constantly busy with their everyday responsibilities. We are therefore very pleased and grateful that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through the good efforts of Professor Jia Yuxin — has decided to publish LICE books. We hope that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with China by making available the work of the authors who have worked with us to create a range of books which mee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needs of everyone involved in ‘language education’ of all kinds.

Michael Byram & Alison Phipps

References

- Han, Hui (2011) *An Investigation of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Culture Teach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Xinjiang, China*.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Also available at Durham E-Theses Online: <http://etheses.dur.ac.uk/109/>
- Qian, Lihua (2011) *Conceptions of the Role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Unpublished PhD University of Aberdeen, UK. Available at <http://www.abdn.ac.uk/library/>

导 读

如果把 21 世纪的全球化学理解为全球公民社会建构的宏大叙事,实现人类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跨文化交际自然成为这个叙事中的文化脉络,这意味着,培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跨文化/全球化社会公民应当成为国家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也意味着,外语,作为重要的人类社会资源,在建构全球社会人际关系和取得跨文化认同中有其独特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外语教育在公民教育中有其独到的,或者说很少有人意识到的价值。配合这一外语教学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的基础上,又推出一系列从跨文化视角进行外语教学的权威力作。Michael Byram, Adam Nichols 和 David Stevens 主编的《在实践中培养跨文化能力》(*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Practice*)一书就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本书原由英国多语出版公司(Multilingual Matters LTD)在 2001 年出版,是该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LICE)中众多著作/编著之一。

该书第一主编 Byram 博士是国际外语教育界的知名教育家,是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教育学院教授,从事包括外语在内的语言教育和跨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任欧洲委员会语言政策顾问、欧洲委员会主办的全球《跨文化交往自传》(*Autobiography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 Europe Council)的主任编辑,是“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丛书主编,还兼任多项国际学术刊物主编和外语教育学会顾问等重要职务。

多年来,Byram 及其团队从跨文化的维度重新审视与外语教学相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并从跨文化的视角,对外语教学在宏观教育中的潜在价值进行分析,对其在全球认同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在对第一语言、外语、跨文化交际与国家身

份和跨文化/全球身份的动态互动关系展开研究的基础上, Byram 提出了超越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涵盖(全球)公民教育之要义, Byram 主张外语教育应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当作教育目标。这样,我们会把外语教学的实用价值,即培养学生与不同文化人们的相互交往能力,与国家和全球的教育价值,即培养全球公民的教育使命相结合,从而培养学习者能以公民身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社会活动。Byram 提出,21 世纪的外语教育应担当起实现外语教育向跨文化/全球公民教育转变的历史使命。为实现此目标, Byram 及其团队著书立说,出版了多部具有挑战性和时代意义的著作和文章,引导着当今世界外语教育改革的潮流。

本书的另外两位作者, Adam Nichols 与 David Stevens 博士, 是 Byram 从事跨文化交际教学和研究的同事, 是他领导的团队的成员。Nichols 主要从事地理教学, Stevens 从事英语作为母语的教学。三位学者在不同领域的教学中都把所从事的教学与文化, 尤其与多种不同文化相融合; 他们以亲身实践证明, 发展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必要, 而且可行。这一共识促使三位不同学科的学者走到一起著书立说, 使我们有幸分享他们的成果。为使本书更具有代表性, 更能展示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在不同学科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编者还从欧洲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邀请了一些同行学者, 加入本书的创作。他们有的从事中学教育, 有的从事成人教育, 有的从事大学教育, 在不同科目和不同层次的教学和研究中,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教学经验。书中很多生动鲜活的实例都源于他们与学生互动的真实语料、独立研究报告、调查数据和实践体验,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的学者用亲身教学经验中的成功实例, 展示如何在语言和外语课堂上实现跨文化交际教学; 有的学者展示如何在地理、法律和文学课堂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专家们不仅能在传统的教学中融进跨文化因素, 做到游刃有余, 同时也打破了传统束缚, 或把学生置身于现实的全球社会交往之中, 或应用现代传播技术把学生引进虚拟的地球村, 使他们直接参与跨文化互动, 在实时跨文化交往中认识他者, 化解文化冲突, 进行身份协商, 承担跨文化责任; 在实时交际中, 运作知识, 表明态度, 发展和提升技能; 同时, 提高思辨能力, 并以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基础, 批判性地审视、评价自己和他者的文化价值、行为和习俗, 尊重并欣赏相异之处; 以他人为镜, 省思自我, 实现跨文化认同。学者们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像传

统教学法那样整齐划一,而是个性各异,五彩纷呈。他们的灵感或源于民族志学研究,或源于文学和文艺批评理论,或源于不同文化人的相互交往协同学习途径,或源于提高文化意识练习途径,不一而足。教学采取不同的形式(问卷、影像、漫画、音频、图片、游览)和多种视角(心理、社会、文化、后现代、多元文化、哲学、宗教、习俗),对不同文化进行多方位诠释;创造真实的交际情景,使学生在亲身经历跨文化交往中去发现、对比、分析、反思、批判、实现自我超越。独特的方法有利于诱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极大的兴趣,使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尽管本书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而且多数文章以理论为依托,但本书并非是学术性的文集,而是从全世界范围的课堂教学中收集的鲜活的跨文化“故事”汇编。从这个角度看,编者采用的不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而是从实践到理论的方法(bottom-up approach)。各章节围绕“实践/体验—研究—理论”的思路展开。

下面介绍该书的各部分、各章的主要内容,并附带简单评论。

导 论

本书旨在为语言教学提供优秀的跨文化教学实践实例,同时,也希望能够为教授社会科学、文学等与文化相关科目的教师提供帮助。书中的实例和叙事都源于世界不同文化、地区和国家从事不同学科的学者和专家的亲身经历,他们详实的语料和数据、鲜活的文化信息和真实体验使读者备感亲切,有身临其境之感。

◎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

- 课堂教学(初级,中级,高级)
- 超越课堂(新媒体技术运用和课外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
- 教学资源开发

◎ 本书突出以下四个主题

- 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及全球文化的意识和分析能力
- 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中陌生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的技能
- 为学生提供独立收集信息的机会,通过走出校园到社会中去,或者借助科技,如通信、网络、电视等来收集材料